

## “符号学研究”特辑

# 解读鲍勃·杰索普的文化政治经济学\*

陈文斌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

**摘要:**文化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后学科的方法,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接受“文化转向”的产物。鲍勃·杰索普试图通过这一方法超越学科边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政治、经济领域进行观照。文化政治经济学整合了符号学的方法和概念,立足符号过程,分析了经济构想被选择、保留、强化的过程,并揭露出这一过程被国家的权力话语所渗透。正是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和符号学的批判性,文化政治经济学为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现实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点。

**关键词:**文化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文化转向

**中图分类号:**I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17)04-0124-04

DOI:10.13715/j.cnki.jxupss.2017.04.023

鲍勃·杰索普提出,文化政治经济学(CPE: Cultural Political Economy)“是一种后学科的方法,它在研究政治经济学时接受了‘文化转向’,且没有忽视符号过程(semiosis)与经济政治物质性的内在关联,而这种关联普遍存在于更广泛的社会形态中。”<sup>[1]159</sup>这一界定阐述了文化政治经济学提出的背景、关注的焦点以及自身的价值。本文对于文化政治经济学的解读,不仅是对于这一概念的厘定,更是希望通过概念的阐释回到现实问题的研究上来,从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立场及诉求,对资本主义社会展开批判。

### 一、从“前学科”到“后学科”

基于学科边界的变动,鲍勃·杰索普对前学科与后学科进行了划分,而划分背后的情感态度又是矛盾的。杰索普认为所谓前学科的方法处于一种局限的视域中,“探讨给定题目的狭隘学科只集中在依据单一学科确定的主题上”,<sup>[2]47</sup>例如经济分析只关注经济学,而忽视了其中的伦理政治维度,故而偏狭。与之形成对比,“后学科的标志是它对已经确立的学科边界线的合法性以及它们采用的更成问题的有导向性的探讨的原则加以拒绝。”<sup>[2]47</sup>正是通过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不同学科可以突破自己的理论局限,从而在更宽阔的视域中去审视研究对象。

实际上,对于前学科与后学科的态度,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我们应该贬抑前者,抬高后者。两者本身就是历时发展的

结果,后学科的突破边界需要立足于前学科边界的确立,学科自身的发展无法在最初阶段就去做统揽全局的观照。也正是基于这样的价值判断,杰索普坦言自己的学术研究是“灵感上的前学科性、实践(或者说劳作)上的跨学科性,追求上的后学科性”<sup>[3]2</sup>。可以说,后学科仍旧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如果说前学科确立了学科边界,并确定了自己的理论范式和核心概念。到了跨学科阶段,学科之间的边界被打破,不同学科之间彼此借鉴,某一学科可以借用其他学科的概念去阐释自身面对的对象,比如将热力学中的“熵”引入到文学研究中。到了后学科阶段,学科边界存在的合法性受到更大的挑战,概念的挪用变成了概念的创造,后学科的分析“不仅应吸收不同的学科和研究传统,还要发展寻求超越学科边界的新的概念和方法”<sup>[2]47</sup>。文化政治经济学的提出,正是杰索普实践后学科分析方法的结果。

其实,前学科、跨学科、后学科,这三者都预设了一个潜在的逻辑,即学科的边界是动态的。即使是已然确立了自身学科边界的合法性,这一合法性也是被建构起来的,而非先验合理的,这就意味着前学科本身潜藏着走向后学科的发展逻辑。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当我们言说边界这个概念时,即使是动态的边界线也应该具有一个本体,一旦边界被抹除,后学科也就成了乌托邦。因此,后学科仍旧是前学科

\* 收稿日期:2017-01-09

作者简介:陈文斌(1992—),男,江苏溧阳人,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成员,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重大课题“当今中国文化现状与发展的符号学研究”(项目编号:13&ZD123)中期成果之一。

展逻辑。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当我们言说边界这个概念时,即使是动态的边界线也应该具有一个本体,一旦边界被抹除,后学科也就成了乌托邦。因此,后学科仍旧是前学科在现实发展下的自我更新和超越,而我们能够做出的努力就是开掘具有超学科性的理论和概念,立足现实发展去革新学科范式。

杰索普将“传统马克思主义和‘文化转向’的连接,目的是提出一个马克思的——变化的‘文化政治经济学’”<sup>[2]49</sup>。之所以选中马克思主义,也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立足现实,不断地自我批判,从而摆脱了所谓单一学科的界限。从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源头看,马克思本人辩证批判了黑格尔、费尔巴哈、大卫·李嘉图等人的思想,汲取了哲学、古典政治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等多学科知识。因而,就其本质而言,“马克思主义理论基本上不受学科分化的限制,其整体特征恰在其‘跨学科性’。”<sup>[4]13</sup>

马克思主义自产生之日就不断地面临着挑战,也正是因为这些挑战,马克思主义展现了自身强大的生命力。具有跨学科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两种处境。其一,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资源,整合进其他理论,比如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等。其二,公然对马克思主义做出相反的姿态,比如鲍德里亚,“以符号生产和抽象的差异性社会性关系,彻底取代了马克思所强调的前提性的社会物质生产结构,从而完全告别了马克思,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直接反对者。”<sup>[5]1</sup>用所谓的能指拜物教去取代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实体世界被完全解构,物品符号变为纯粹的能指”<sup>[6]78</sup>,从而走向了现代唯心主义。值得注意的是,诸如后马克思主义这类批判者仍旧在沿用马克思主义所确立的概念范畴,也正是通过保持对抗姿态才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不论是整合还是反对,马克思主义本身仍旧存在并延续着旺盛生命力。文化政治经济学既要接受“马克思的前学科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启发”,又要以“后学科的方式利用社会科学家广泛的学识和研究”<sup>[7]1</sup>。现代学科经历了几次“转向”,即从心理学转向到语言学转向,再到如今的文化转向,马克思主义身处其中也受到转向的影响。马尔库塞、弗洛姆等人用精神分析改铸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则将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融入到意识形态分析,到了杰索普这里,“文化政治经济学严肃地将文化转向(关注意义创建)带入政治经济学批判。”<sup>[3]8</sup>这种学科理论范式转向与马克思主义的碰撞将开辟一块新的视域,去重新审视变动不居的现实世界。

## 二、马克思主义与文化转向

何谓“文化转向”?杰索普认为,“‘文化转向’被给予了广泛的和多重的解释,它以话语、意识形态、同一性、叙事性、争论、修辞、历时性、自反性、阐释学、解释、符号学和解构的形式对研究加以覆盖。”<sup>[2]49</sup>这一解释声明了文化研究对学科方法多样化的运用,也正是因为接受“文化转向”,“文化政治经济学组合了诸多概念和方法,这些概念和方法来源于批判性符号学分析与批判性政治经济学,这就为(研究)资本

主义社会结构提供了一种独特的后学科性方法。”<sup>[1]159</sup>从杰索普的解释中可以发现,符号学既作为文化转向的方法论之一对资本主义社会展开批判,同时,文化政治经济学在接受转向后,也对符号学的方法和概念进行了重组。

光是多学科方法运用,重组不同学科概念,文化政治经济学就与众不同且具有阐释效力?杰索普认为“文化政治经济学不同于其他文化转向”<sup>[1]159</sup>,而这种不同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核心范畴的运用;二是符号分析方法,并与激进的、非正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相接合。”<sup>[3]8</sup>

所谓核心范畴,即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所立足的积累体制,以及资本主义的国家形态。不同的积累体制需要对应不同的国家形态才能稳定,“与战后形成的大西洋福特主义积累体制相对应的是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而在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东亚新兴工业国的出口主义积累体制形成的是李斯特主义工作福利民族国家;最后是在全球化的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上形成的熊彼特主义工作福利后民族的政治体。”<sup>[8]31</sup>这样的两两对应,体现了资本主义国家形态的历时性变化,不同的制度往往是为了解决特定时代的政治经济问题。因此,文化政治经济学反对超历史的分析,总是将核心范畴的研究放置在特定的时代环境中。

按照杰索普的理论逻辑,随着资本主义现实的变化,一种经济结构会被另一种经济结构所取代,比如为了应对大西洋福特制危机,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KBE: the knowledge-based economy)应运而生。而产生这种更换的深层原因可以借助符号过程(semiosis)这一概念加以解释清楚。所谓符号过程,“就是用符号再现、传达、解释意义的过程”<sup>[9]258</sup>。这一概念的引入将现实世界作为意义世界加以考量,从而将经济结构的变化视为符号运作的结果。

以符号过程为着眼点,杰索普实际上提出了三个问题。问题一,“符号学内外的因素是如何影响符号过程中的变异、选择和保留?”<sup>[1]159</sup>;也就是说,某一经济构想最终能够被选中并贯彻于实际,取决于自身适用性和外在话语支撑。杰索普认为,符号过程的运作同样需要立足于物质现实,在众多可选制度中,个体、组织和机构对某一制度有共鸣话语后,再将制度落实到现实中经受考验,发挥效力的制度被继续强化,最终成为最佳的制度选择。这一符号过程潜藏着进化论的思维,“不同的国家理论解释都需要经历‘变化’、‘选择’、‘保存’的‘现实检验’。”<sup>[8]29</sup>符号意义的解释者在话语选择中的地位被凸显,随着解释者的数量增加以及话语权增强,本来只是可能性之一的理论,伴随着符号过程的运作,成为一种颠扑不破的最佳选择。

问题二,“符号过程又如何与调整、再生产、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实践相联系?”<sup>[1]159</sup>也就是说,符号过程作为一种形式分析如何与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相契合。符号学是研究意义的学科,“社会过程实际上是通过意义的生产、循环与交换所达成的”<sup>[10]101</sup>,资本主义社会的积累策略以及镶嵌其中的社会形态同样是意义的生产过程,符号过程就是研究意义的产生、变化和确定。这种调整、再生产、改变资本主义社

会结构的实践都是由实在的行动主体操作的,而为何调整,怎样调整,是否再生产,能否改变都是一种话语建构,实践本身也是一种话语选择的结果,“行为主体可以意使任何事物踏入精心编排的话语中,或者用精心编排的话语来证明事物的存在。简而言之,文化政治经济学承认符号过程的构成作用,承认社会关系所呈现出来的符号学以外的特征,也承认它们两者对行动能力和转换能力的联合影响。”<sup>[1]161</sup>不同于简单的“话语还原主义”,文化政治经济学强调了话语背后的主体实践与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

问题三,“符号过程在分析、建立、暂时稳固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方面扮演了什么角色?”<sup>[1]159</sup>这一问题指向了符号过程的作用,实际上,符号过程是“社会生活的基础,在任何一个对社会世界的性质和动态的严肃性解释中,思想或意义体系都不会成为一个可选的附加项。”<sup>[3]9</sup>也就是说,符号过程是意义世界的运转状态,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分析、建立和稳固,都是一种符号过程。正是通过将纷杂的动态变化转化为可归纳的符号过程,我们才能够看清社会结构整体的运转。从符号过程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对社会形态加以引导和改造,最终将其维持在某一形态中以形成秩序。

对于上述三个问题的解答,杰索普确立了符号学分析方法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阐释效力。传统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关注的资本主义社会问题,同样可以纳入到符号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总体本质有着精辟的分析,而符号过程可以对具体的制度及其运行机制进行解释,从而将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聚焦到当前的、乃至未来的制度运行和演变中。

### 三、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和国家

杰索普对于资本主义制度演变的分析,包含着一种进化论的思维。因此,社会现实就成为这一进化的本体,当本体自身遭遇危机,只有制度的进化才能延续本体的生命。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是在回应大西洋福特制危机中产生的,而大西洋福特制曾经促进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和消费,但伴随着机械化的过量生产和民众消费力的减弱,经济危机为其他经济话语的崛起提供了契机。

面临危机,社会开始重组,“不同的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叙述产生交集,根据过去的错误和未来的可能分析它们,据此试图去给存在的问题赋予意义。”<sup>[1]167</sup>在这整个的叙述交集中,个人的、组织的、机构的话语开始发出,处于不同阶级、阶层和团队的个人也在传达自己的观点。整个符号过程就变成了话语的发送、传递和保留,而被资本所控制和主导的大众媒体将能够主导符号过程的运转,以强势的话语权去确立某种话语的正确性。这一强势话语的背后就是资本主义国家的霸权愿景,实现这一霸权意图的方式则是经济构想。

杰索普指出,被选中的经济构想需要符合两个要求。一是适用性,即它可以适用于不同公司、区域、国家,乃至所有的领土;二是灵活性,即它可以根据社会条件的差异做出调整。这一经济构想“能够处理越多的领域,它将越会有共

鸣和影响力。这解释了知识经济的力量是一种持续增强的统治话语和霸权话语。”<sup>[1]168</sup>这样,文化政治经济学在提出“经济构想”这一概念时,就是对经济进行文化分析。经济形态合法性的确立不再是自发的,而是话语选择的结果。

回到杰索普对积累策略与国家形态的对应分析中,为了应对不同历史时期的危机,通过经济构想,某一积累策略被选中,并在现实操作中发挥效力。随着效力的适用性和灵活性得到验证,这一经济构想就成了主流叙述。而当资本主义国家再次出现新的危机,路径开始被重新设计,设计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解决危机,因为在多种话语选项中,其他话语并没有被实践检验为无效。之所以被选中,也是因为这一话语契合了资本主义国家的霸权愿景,在解决危机的过程中可以实现其霸权意图。

杰索普通过文化政治经济学分析最终还是指向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在他看来,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是美国政府为应对“来自欧洲和东亚对手日本日渐增长的竞争挑战”所作出的回应,“这些积累策略依赖于保护和扩展美国资本优势的大范围的知识产权。”杰索普所判定的霸权论继续指认,“这可以被看成是新自由主义为了生产资本在自由贸易的掩护下保护其超额利润的政策,以及为了金融资本对其新自由主义的补充。”<sup>[11]51</sup>这样的结论说明,经济构想的推行属于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

当我们认定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合法性时,我们是否仍处于意识形态的牢笼中?杰索普做了肯定的回答,因为他始终将经济制度与其背后的国家联系在一起。杰索普认为,“国家是一种社会关系”<sup>[8]29</sup>,这一观点沿袭了马克思的“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sup>[12]877</sup>。在这一界定之下,杰索普指出,“我们必须把国家权力视为隐藏在社会关系当中,而不是当做一个简单工具。”这种关系论契合了杰索普接受文化转向的态度,因为“文化转向的关键特征是它对权力的话语解释”<sup>[2]46</sup>。这样,一切都明了了。

杰索普在提出文化政治经济学时,已然接受了文化转向对于权力话语的判断,即权力话语渗透于整个意义世界中。与福柯的微观权力分析不同,杰索普将权力话语对准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范畴,即积累制度与国家形态,宏观地判定所有经济政治制度的选择、保留和强化都是权力话语操作的结果。符号过程的分析将能够揭示权力在其中运作的形态,对于权力话语的分析也将避开“话语还原主义”,而始终盯紧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变化。

正是基于对权力话语渗透的敏感,杰索普将意识形态笼罩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制度视为必然事实。从符号学角度解读,“意识形态的主要功能是在社会中形成‘思维共识’,即让人们按照同一种元语言来理解和接受社会现实”<sup>[13]159</sup>,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存在合理性变成了共识,但事实是,即使是已然被确证为有效的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都只不过是暂时性地在发挥作用。用一种超越的眼光看,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仍旧会被其他经济构想所取代。之所以这一话语仍

施,个体、组织、团体都会继续发出他们的话语,只不过这一话语还是被拥有绝对宰制权的国家所控制,通过意识形态元语言将这一构想内化为社会个体的集体无意识。

这里产生的问题是,当杰索普以警惕的眼光审视现实时,批判的源头指向了国家。国家不再是工具,而是“一种社会关系”。这样的话,所有的批判又都指向了自身。被国家确立起来的经济构想,同样也是个体、组织、团队之间关系的产物,我们自己构筑了笼罩着我们的意识形态牢笼。

这一思路的剖析照应了杰索普自身的研究思路,“我们所处的世界及其社会活动太复杂了,因此不能认为从某一角度或者某一观点出发就可以完全理解世界,所以我们要简化它,从而产生理论活动,我们不可能涉及到所有方面,我们只能从某一方面来理解。因此,我们在研究国家时,也必须对国家进行某种方式的简化。”<sup>[8]28</sup>因此“国家是一种社会关系”也是一种简化的策略,聚焦了国家构成的一个方面。

延续这样的逻辑继续思考,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也是对于经济形态的简化,这一简化聚焦了当下文化经济化的现状。同样的,意识形态也被简化为无处不在的牢笼,这一简化让我们意识到,不管我们做出何种选择,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这样的思路揭开了意识形态的面纱,照应了齐泽克的说法,“当我们以为我们可以遗忘意识形态之争的时候,今天恰恰是意识形态最强之时,因为当人们认为没有意识形态时,意识形态就化身在他们的日常实践中。”<sup>[14]63</sup>文化政治经济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仍旧承继着分析现实、批判现实的理论使命,它在对文化、政治、经济领域的全面观照中,借鉴并整合了符号学的理论和概念,选取并聚焦特定的经济问题,为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现实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点。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任何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和改造都可能存在不同程度的误读,文化政治经济学也不能作为阐释社会问题的单一话语。只有回到马克思主义,以辩证的思维去看待现实本身及解释现实的话语,才能更为清醒地直面世界。

## 参考文献:

- [1] Bob Jessop. Cultural political economy and critical policy studies [J].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2004, 1(2).
- [2] 岑艾玲,鲍勃·雅索普. 论文化政治经济学中的前学科性和后学科性[J].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5(3).
- [3] 阿涅斯·拉布鲁斯,托马斯·拉马什,朱利安·韦科伊,著,顾海燕,译. 跨越界限:走向文化政治经济学——对话鲍勃·杰索普[J]. *国外理论动态*,2014(5).
- [4] 刘方喜. 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跨学科性”[J]. *文学评论*, 2011(3).
- [5] 鲍德里亚. 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M]. 夏莹,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
- [6] 张骋. 符号操控与本体虚无:反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大众传媒观[J]. *符号与传媒*,2013(7).
- [7] Bob Jessop. *The Future of the Capitalist State*[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2.
- [8] 鲍勃·杰索普. 重构国家,重申引导国家权力[J]. *求是学刊*, 2007(4).
- [9] 胡易容,赵毅衡,编著. 符号学-传媒学词典[Z]. 台北:新锐文创,2014.
- [10] 何子英. 文化政治经济学批判、竞争式治理与危机管理的危机——杰索普国家理论的新进展[J].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6(4).
- [11] 鲍勃·杰索普. 文化政治经济学: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和国家[J]. *现代哲学*,2004(4).
- [12] 马克思. 资本论(第一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13] 冯月季. 从政治化到世俗化:意识形态的符号学转向[J]. *符号与传媒*,2016(12).
- [14] 蒯乐昊. 我们仍然需要马克思主义——专访齐泽克[J]. *南方人物周刊*,2007(17).

责任编辑:万莲姣

## Interpretation of Bob Jessop's Cultural Political Economy

CHEN Wen - bin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ichuan University, Chendu, Sichuan 610064, China)

**Abstract:** As a post-disciplinary approach, cultural political economy is the product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that adopts the “cultural turn”. Bob Jessop tried to use this method to transcend discipline boundaries, so as to explain the cultur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aspects of capitalist society. Cultural political economy combines concepts and tools from critical semiotic analysis, analyzes the process how the economic imaginary is selected, retained, strengthened based on semiosis, and reveals this process being invaded by national power discourse. Cultural political economy absorbs the critical nature of Marxism and semiotics, which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criticized the capitalist society.

**Keywords:** cultural political economy; Marxism; semiotics; cultural turn